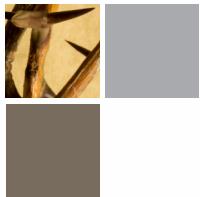




#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第37-38期  
2019年11月



## 中華文明與世界諸宗教互動下 多元身分認同問題之再思

李景雄（本社首任華人社長）

### 前言

筆者與1919年5月4日啟動的五四運動結下不解之緣。1974年的神學博士論文中，<sup>1</sup>正是對五四運動新時代思維作出如下總結：

1. 尋找新社會秩序：故舊帝制和封建社會制度漸成過去，中華民國建立，自由民主、馬克思共產主義、關顧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時初萌，全國急不及待新社會秩序出現。
2. 科學與價值及人生觀：五四運動發展出來的新文化運動，除了有語文革新的環節外（白話文學運動），又有推崇「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的倡議。如此掀起科學觀與道德價值及人生觀的議論。



1 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修讀神學博士課程時，論文題目是“A Critical Analysis of Key Intellectu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Thoughts of Hu Shik, Li Ta-Chao, and Laing Sou-Ming.”。



3. 中國文化的身分認同：五四運動由始至終是以中國人為主體，而中國人不可能脫離中國文化，縱使中國文化在演變中，演變就牽涉身分認同的問題。

時過三十餘年，2018年5月4日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以下簡稱「宗文社」）慶祝創立六十周年紀念。本人作為宗文社第一任華人社長發表演詞，再從五四運動展望未來十五、二十年，以香港為立足點，反思中國文化在未來的世界大局勢下的定位。該文的結論簡列如下。<sup>2</sup>

1. 中國文化依然在尋找新社會秩序。固然中國國家與社會於百年歲月中已經打了幾個大筋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人都站起來了」（毛澤東高呼）——三反五反——經濟緩慢發展——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幫——經濟開放（鄧小平）——六四抗議流血收場——經濟和社會稍為和緩（胡、溫時代）——中國崛起躍升為世界級政治大國（習近平）。
2. 繼續探索在世界洶湧波濤裡中國國家及文化的身分認同。到了廿一世紀，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進入一個新紀元，可否於穿插、交織、互動、抗力、融合……之中，演變各自嶄新的身分認同？
3. 進一步追蹤尖端科技發展與人性、心靈、精神生命、普世價值、終極關懷之關連。五四時代推崇的科學是啟蒙時代的科學，如今已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其特徵是以互聯網將全球連

結起來。結果震撼全世界。不論生活方式、民生問題、精神生活、價值取向、自然生態、創新與幻滅、還原與終結等。

## 世界文明發展的反省與前瞻

為繼續探索五四運動一百年以後，展望未來，在巨流之下中華文明的前景，且先了解世界級大師對當代文明的評論及反思。

1. 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93年於刊物*Foreign Affairs*發表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章，<sup>3</sup>陳述繼「冷戰時代」結束後，全球大勢力之衝突，乃是沿着三個大文明體系間之斷層。分別是「基督教文明」（Christian Civilization）、「儒家文明」（Confucian Civilization）和「伊斯蘭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此三大文明之分野實有濃厚的宗教成分，當然有長遠的歷史淵源，是跨地域、跨國界的。亨廷頓的宣言引起強烈的反響。1997年他發表另一份宣言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2 原文刊登於宗文社通訊2018年12月第47-48期。

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Order”。大意是，要補救文明的衝突，有賴各單元如國家、民族、宗教、財團等適應、博奕、角力、外交等非常複雜的過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及「世界秩序重整」有粗疏之處，可是以學術宏觀而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 瑞士籍天主教神學家漢斯·孔 (Hans Küng) 是一位多產作家，範圍非常廣闊。關乎全球倫理、世界和平、世界大宗教，其意旨非三言兩語所能論盡。漢斯·孔的名句 “No peace among the nations without peace among the religions.”<sup>4</sup> (沒有世界和平，除非先有宗教和平) 孔神父身體力行，參加促進世界和平的會議。
3. 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是日裔美籍政治學教授，當代政治學學者。他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學思維上的演變歷程可作參照之用。蘇聯解體與柏林圍牆拆毀後，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恢復其全球優勢地位。所謂 “the end of history” 是指意識形態衝突的末代。<sup>5</sup> 倫理及品德

對社會秩序乃重要議題，而福山展示一套“Neo-conservativism”（新保守主義），美國列根總統管治 (Reagan Administration) 是佼佼者。2001年紐約市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Islamic Fundamentalism) 帶來的恐怖暴力。小布殊總統 (George H. W. Bush) 主張推倒伊拉克獨裁暴君沙登胡辛 (Saddam Hussein) 及追擊恐怖同盟領袖拉登 (Ben Laden)，是美國統治二十世紀末一重大轉變。福山初時認同美國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強硬政策，可是後來與小布殊的中東政策保持距離。福山批評小布殊總統比其父老布殊總統 (George W. B. Bush) 更為保守，逾越了新保守主義的界線。<sup>6</sup> 另外，「身分」問題出現，沿自「憤怒」的政治。<sup>7</sup> 特朗普總統 (Donald Trump) 及英國「脫歐」 (Brexit) 所產生的「憤怒」，不能不重提「身分」的問題。什麼是「身分」？美國政黨的身分在急劇轉變、歐洲同盟與「脫歐」造成多方面的身分認同問題異常複雜。

4. 新科技專家兼企業管理專才克勞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討論「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臨所帶來的挑戰是什麼？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氣機的發明。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力和生產線的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電腦和數位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建立於電腦和數位革命的

4 Hans Küng, *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 (New York: Continuum, 1995).

5 Francis Fukuyama ,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6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the Demand for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基礎上，其特點是：i) 網絡變得無所不在；ii) 移動性大幅提高；iii) 感測器體積變得更小而性能更強大；iv)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開始嶄露鋒芒。<sup>8</sup>其「顛覆性影響」如下：

- i. 經濟：爆發式增長和就業困境。一方面，經濟爆炸式增長，而增長亦有衰退，甚至大幅度的衰退。另一方面，無論是經濟增長或衰退，都造成各種的就業困難，如機器取代勞動、「再教育」追不上新行業所需的新興技術等。
  - ii. 企業：不改變就滅亡。無論是新時代企業所需的領導、組織、資源配備等；或是新興企業的經營方式，如廣增消費、方便客戶付帳等，都有急劇的變革，不然就是滅亡。
  - iii. 放眼國家和全球：國家、地區、城市政府不能不插進來應付企業在經濟上的急劇變化。跨國界、跨地區的組織也得加入。此中的衝突、配搭、磨合都涉及超級的智慧和技術。
  - iv. 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箇中牽連社區安全、貧富差距、環境保護、階級分歧與重組等等。
  - v. 無孔不入的高科技，其實不止是技術的問題，更是智慧的考驗。身分認同、道德與倫理、公共資訊與個人私隱等等議題都統統出來了。
5. 美國天才理論物理學、宇宙學家史蒂芬·霍金（1942-2018）有十個「大哉問」，此處僅選了三個「大哉問」，<sup>9</sup>讓我們去

了解科學的非絕對性與人工智能的無限潛能。

- i. 「黑洞」（black hole）是霍金提及最出名的宇宙學大理論之一，是許多殞星崩陷後的結果與特性——黑瀉瀉無邊無際的空洞。那是我們外人無法領會的，但姑且聽霍金說有這麼一回離奇的事。霍金隨便挑一個大黑洞，那是銀河系中心的黑洞，其質量為太陽的四百萬倍。又或選一個「迷你」黑洞，微型又微型了，霍金預測他可能觀察到一個現象，在兩道粒子以相反的方向繞行，達一定速度後，碰撞而可能創造出微型黑洞，哪又怎樣？掉入黑洞，不管是巨型或微型，資訊遺失成空，一切計算都蕩然無存。如此說來，科學「決定論」（scientific determinism）就拆破了。換言之，無論科學家如何盡力計算又計算，始終有些悖論或漏洞吧。

8 克勞斯·施瓦布：《第四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譯（台灣：天下文化，2017），頁20-21。

9 史蒂芬·霍金：《霍金大見解：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蔡坤憲譯（台灣：天下文化，2019）。



ii. 「上帝存在嗎？」——老早就聽聞霍金不相信上帝存在。然則他是「無神論者」（atheist）嗎？若是「無神論」（atheism）證明神／上帝不存在，霍金並無拿出證據如此證實。反覆看了他這個「大哉問」，與其說他着意打倒「有神論」（theism），不如說他認為無須假設位格神的存在。畢生研究自然律的科學家霍金，認為宇宙是從空無（nothing）之中突然而來的。自此之後，宇宙經歷種種演化過程。有些定律可以是由上帝所頒布的，也可以不是；但無論如何，上帝都無法再干擾或違背這些定律，否則這些就不能稱為定律了。如此，霍金並沒有進行證明上帝不存在，也沒有否定其存在。乾脆點說，沒有假設上帝存在必要。換言之，不假設上帝存在比假設上帝存在，在邏輯上簡單得多。不過他有幾句話倒耐人尋味：「跟愛恩斯坦一樣，我使用「上帝」這個詞，也是採取一種非人格的態度，指的是自然律。因此，所謂了解上帝的心靈，其

實就是了解這些自然律。我個人的預測是，在廿一世紀末之前，我們便會了解上帝的心靈。」<sup>10</sup>再者，霍金回答「上帝是否創造了宇宙？」

的問題，這個問題本身沒有意義。在「大霹靂」（big bang）之前，時間根本不存在，因此沒有時間讓上帝去創造這個宇宙。

最後，霍金自問：「我有信仰嗎？我們每個人都有自由，去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而我的觀點是，最簡單的解釋方式是上帝並不存在。這個宇宙不是由任何人創造的，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主宰我們的命運……也許天堂和死後的靈魂世界，只是一種痴心妄想。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它存在……我想，當我們死後，就只是一抹黃土。所謂的「死後猶存」，指的是我們的影響力，以及我們傳給下一代的基因。我們能有此生來欣賞宇宙的大設計，對此，我深表感恩。」<sup>11</sup>原來大科學家理性至上的霍金有他人性一面。返回霍金的「黑洞」論，他暗示科學「決定論」不是絕對的，而是可能有漏洞的。這麼一來，所謂科學的「自然律」並非必然排除了解上帝的存在。

iii. 「人工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雖然來自人類專家的設計，但是當AI比人類更會設計AI時，它便能持續自我改良與優化，而不需要人類的幫助。我們所面對的將會是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最終的結果是機器擁有比我們還要高的智能，可能比起人類超越蝸牛的程度還多。

10 《大哉問》，頁58。

11 同上，頁71。

人工智能自然有利也有弊。AI能帶來巨大的潛在助益，當智能透過AI所提供的工具而增加、放大後，可能達成前所未有的成就，如大幅度的根除疾病與貧窮。然而AI的巨大潛能亦可能帶來嚴重的傷害。例如：世上的軍事強權正展開AI武器系統軍備競賽，智慧型機器比人類在金融市場更聰明、更會投資，結果操縱市場操作及人心慾望。霍金認為這些事情有必要研究的。

6. 古代的「絲綢之路」沿自十三世紀，中東與中國西部之間用駱駝載運貨物來往的跨廣大地域的貿易樞紐帶。從中國載着絲綢往中東地帶，又由中東載着香料、藥材、茶葉等貨物回到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幾個世紀以來，斷斷續續一定帶來不少貿易利益。廿一世紀的「一帶一路」，可謂「新絲綢之路」，增加的內容及路途成為全球性的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的鴻圖大略。地帶不限止於中東，還有東南亞、中蒙俄經濟走廊、東歐、非洲、南美洲、中美洲，還有海面通道云云。

「一帶一路」無疑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資金的投資及運用，極重要的成果是互惠互利的多贏創舉。獲益的成果可用金融計算，亦是基建的建設、民生水平的提高云云。當然亦必有高度的風險，包括策略失損、官僚作弊、政治困惑、生態失衡等。然而看完《世界新趨勢》全書，所得的印象是什麼？「一帶一路」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巨大鴻圖。<sup>12</sup>鴻

圖大略一定是，但可否付諸實行？全部實施絕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否一步一步來？根據已踏出的幾步，亦是分段、分地區開始。要走到何時？無人可全知，或具備依照大數據的臆測和困惑。總的來說，別要打消「一帶一路」為中國在廿一世紀的全球新格局可扮演的重要角色。

7. 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教授王飛凌，曾在中國、法國、意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sup>13</sup>王在《中華秩序》一書開頭便說，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意思是漢族以外還有其他民族，甚至數十個「少數民族」，在中華歷史上曾扮演過或大或小的角色。補充一句，「中原」即是黃河與長江源流之中的中原地帶，那是被稱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華文明」是一廣大幅度並且淵源長遠（五千年）的文明體系，那不是限制於漢族，還有其他種族（來自「中原」以外），不斷重疊起來的文明共同體。

以後經歷秦漢政體的中華帝國、唐、宋、明朝代文明之鼎盛與衰落，元與清朝代的外族（蒙與滿）侵入。其間透過「絲綢之路」，中國中原與中東地帶有往有來的經商以及文化交流。又有印度西域傳入佛教；西方國家傳來基督宗教以及介紹科技與民主、自由的經濟政治體制。直至「百年國恥與進步世紀」。「國恥」是中國受西方國家的經濟侵佔，加上政治高壓手段，還有日本的軍國主義軍事侵略，總之是長達一個世紀的國恥與衰落。

12 多麗絲·奈斯比特、約翰·奈斯比特、龍安志：《世界新趨勢：「一帶一路」重整全球化新格局》（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8）。

13 王飛凌：《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台灣：八旗文化，2018），頁305-307。

二千年的皇帝政體推翻了，中華民國成立。豈料帝制復辟，國民黨北伐，甫成功又發生內亂。中日抗戰結束後，中國內戰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站起來了」！中共的「新秦漢政權」，後毛澤東時代：中共政體的改變和延續。次優化經濟與富國強軍。中國崛起為世界級經濟政治大國。中國夢想著中華復興與全球治理，其中有四個可能發生的現象。<sup>14</sup>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進一步演變，成為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秦漢政體。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到毛澤東的革命政權模式，乃至更甚，成為一個硬化的威權主義、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權，通過謀求重新安排世界而求得生存。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兩股力量撕裂：一邊是中共秦漢式統治所追求中華秩序的本能慾望和不懈企圖，另一邊是不斷變化的中國人口構成、經濟現實，以及日益西化且與國際社會息息相關的中國新文化和新意識形態。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回頭延續在其2008至2012年之前已經持續三十年的做法，繼續隱瞞其中華秩序的戰略選擇，韜光養晦，不再大力抵制、攻擊和取代美國，並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從此務實和選擇地遵循西發里亞（Westphalia）體系<sup>15</sup>和西方的領導，在抵制國內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變革的同時，壓制其菁英們對領導世界的渴求，小心謹慎，投機取巧，繼續發展致富。

14 同上。

15 西發里亞(Westphalia)是現今法國與德國之間的地域，於十七世紀中葉，多個邦國經過「三十年戰爭」，因宗教而牽連邦國三十年的紛爭，多個邦國藉著一連串的會議，達成協約，界定並尊重邦國的主權(sovereignty)。「西發里亞協約」(Westphalia Agreement)成為現代西方國家與其東地區關係的基礎。

16 譚中：《簡明中國文明史》（香港：三聯，2018）。



8. 中國學者譚中<sup>16</sup>，旅居印度多年，鑽研及講學，後來定居美國，擔任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十餘年，現任雲南大學顧問兼訪問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名譽高級研究員等。出版中英文書籍二十多部。譚中不是廣為人知的學者，可是他的《簡明中國文明史》引起本人注意，以其抨擊「中國種族中心傾向」（Sino-ethno-tendency），並取而代之的「中國文明」路向。原著英文書名的副題“Odyssey”，即「漂泊旅程」，可圈可點。譚中的主軸論點是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既不是種族自我中心內向，亦不是發自自我中心向外征服的途徑，反之，卻是冒險漂泊旅程。話說譚中倡議中國文明誕生於喜馬拉雅圈（Himalayan Circle），與印度文明為孖生兄弟。及後中國文明才移往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原發展下去。發展的不是以國家為中心，而是以文明為中心的「命運共同圈」。譚氏又抑低中國以漢族為主的種族主義。那是有商榷餘地的。無論如

何，五千年的中國文明是由「地理共同體」孕育了大的「文明共同體」。

譚中教授的啟發在於他把「中國國家、種族中心傾向」轉移到中華文明的漂泊旅程，其方向並非清晰明確，而是具備向外伸展的冒險無畏精神的。

至此本文共分為「三部曲」，在前言與文明發展的反省後，再以五四運動本身備有的主、副旋律，既回顧過去又瞻望前景，產生共鳴、回響、預兆。

## 第一部曲：在中國及世界持續探索新社會、經濟、政治秩序

中國從「小康之家」（鄧小平）、「掃除貧窮」（胡錦濤）至「大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習近平）。「歐洲同盟」、「新資本主義」、「新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及「議會民主」的考驗。難民政策所帶來伊斯蘭恐怖暴力的陰影。北美洲美國種族平等表面呈現白種民族主義的抬頭。

然而在中國以及全球的急劇演變下仍未展示任何定形的社、經、政新秩序，然則知識分子無動於衷、不聞不問？畢竟五四運動是知識分子帶動的文化新思潮。本人的姿態是持續探索，即使至五四百年往後，與其觀望廣闊的場景，不如縮小至香港與中國關係為案例。

個案（一）：且從香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的角度窺視。視特別行政區與宗主國在政制上微妙的關係，經

濟利益上的矛盾，以及法治制度的爭辯。不是理論抽空討論，而是實際情形之下的法庭審判。

2014年「佔中運動」，原意是用和平、非暴力抗議方式，向政府施壓，履行「基本法」承諾在香港實行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及議員，結果「非暴力」引發暴力的行動。三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連同其他七人，經過長時間法庭審判過程，被判有罪，分別入獄及各種原因得以緩刑。法官、被判入罪者、建制派人士、較激進的民主擁護人士等等的回應，展現於相當廣闊的光譜。換言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宗主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著對社會、政制、法治廣闊程度的差別，遑論任何明確的共識，不僅是理念上，亦就情緒和目標而言，箇中的張力，有理想亦有現實的訴求。

個案（二）：「廣深港高速鐵路優化計劃」主管部發現香港段紅磡站交接點多組繩絲母子配入不符合標準，幾個部門及組織則各自推卸責任，事情變為糾纏不清，竟然有遺失檔案之說。若干高層人士被逼辭職，但如何補救過失迄今仍未有答案。這反映出混合架構的管治問題、制度絕非清徹透明。是的，一百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尋找新社會秩序的出現，迄今在細小的香港，遑求建立新的社、經、政、法、管理秩序輪廓的出現。

結論是什麼？話說前人的反省有其參照的價值。如亨廷頓教授「世界秩序的重建」亦不過獻上提示，來重整幾個文明大體系的衝突。如何用諸於細小香港與宗主大國的關係上，有待細嚼消化。又如福山教授遊走「新保守主義」，在小布殊總統軍事推動中東暴力霸強保持距離與支持尋找生物科技產生的社會準則之間搖搖擺擺的作風。有何付諸於香港特區與宗主國的拉鋸爭端？尚待澄清。

## 第二部曲：探索在頂尖科技發展的衝擊之下，人性的再思與重整、心靈的深探、精神生命的延續、普世核心價值與宗教的終極關懷

是的，五四時代的賽先生不過是啓蒙時代科學的萌芽，百年之後進入廿一世紀資訊高科技、理論物理學、天文宇宙學已經有巨大而戲劇性的演變。現今及二十年以後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終極關懷是什麼？若說無須追問，此豈是知識分子所能顯示的心態！然而有心性、有人性、有靈性之士繼續反思、探索、默想、追求解答。如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所言，迎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四種智慧。此處引述兩則：

「許多城市會將能夠對能源流通、物流運輸及交通等領域進行管控。目前率先實踐這一理念的地區，如新加坡和巴賽隆納，已經開始實施許多數據驅動的新服務。例如智慧停車方案、智慧垃圾回收以及智慧照明。」<sup>17</sup>

「位於西班牙北部的桑坦德市已經安裝2萬台感應裝置，將實體建築、基礎設施、交通運輸、通訊網絡及公共資源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座城市為新功能的探索與檢驗提供了實體場所，這些新功能包括了交互和管理協定、設備技術以及各項後勤服務（如發現、身分認證管理及保全）等。」<sup>18</sup>

美國麻省科技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是世界頂級科技及科學學院，其教學與研究水準是舉世聞名的，而較少為人知的是，MIT 對人文學科、人類文明、世界宗教的重視。筆者1980年代在波士頓時曾旁聽MIT一位著名世界宗教教授休斯

頓·史密斯（Houston Smith）授課，其中不少聽眾是來自台灣與中國的留學生。筆者曾與多名基督徒留學生交談，他們領會在當今科技高度昌明時代，倫理建構、心靈深探、精神歸宿等是知識分子無可逃避的。

香港呢？香港有個「香港科學園」。網址標榜該科學園供給創意企業實驗，鼓勵創新的商務及工業云云，列出多項宣傳。然而同時有相應的公眾利益的探討嗎？似乎寥寥無幾。

另一方面，香港的「社會企業」（Social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s）相當蓬勃。從謝家駒博士創立的「仁人學社」<sup>19</sup>，可見香港不乏具創意的社企菁英。社會企業固然要持守經濟效益，以確保經營增長，而獲得的利潤除了維持企業正常生存之外，不是滿足私人利益，而是為了增強公眾利益。<sup>20</sup>

再看李開復、王詠剛合著《人工智慧來了》，<sup>21</sup>李開復博士生於台灣，長於美國，為卡內基美隆大學電腦學博士，曾任蘋果、微軟、Google頂尖科技公司要職。王詠剛畢業於北京大學，後往美國任職Google及方正奧德公司主任工程師及技術總監。兩人合著的《人工智慧來了》宣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時代的來臨。

「人工智慧」是什麼？有多個定義。姑且採納其中一個提議：人工智慧是「智慧主體」（intelligent agent）研究與設計的學問，而「智慧主體是指一個可以觀察周遭環境，並且採取行動以達成目標的系統。」<sup>22</sup>這裡所說的「智慧主體」是由人工智慧所產生的，不是有血、有肉、有心、有感情、有靈性、有精神生命的主體。是的，人工智慧AI帶來巨大無比、

17 克勞斯·施瓦布：《第四次工業革命》，頁188。

18 同上，頁190。

19 參仁人學社網頁：[www.education-for-good.com](http://www.education-for-good.com)。

20 參謝家駒、蔡美碧：《社創群英：以社會創新改變世界的人》（香港：雲起文化，2013）。

21 李開復、王詠剛：《人工智慧來了》（台灣：天下文化，2017）。

22 同上，頁53。

前所未有的變革，對產業、經濟、社會，乃至人類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sup>23</sup>

在《人工智慧來了》一書的總問題：AI時代，教育應該關注什麼？其中一項是教育體系的設計，必須更早、更充分地考慮社會整體的公平性。「利用極其完善的互聯網資源和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真正做到高品質教育，無差別普及到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這在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上，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但線上教育、虛擬實境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組合，也許就是解決教育公平的最佳技術方案……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學習或教育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讓每個人在科技的幫助下，獲得最大的自由，體現最大的價值，從中得到幸福。」<sup>24</sup>

從這個AI超速發展下激活的教育課題，轉向細小香港的高等教育界（higher education）面對的問題。香港有十多間大專，陸續升格為大學。說實話香港高等教育界可能自稱既專門且優化，不過高層教育界人士尚欠了解體會，嘗試配合人文學科、人性探討、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等。

出乎意料，2018年升格為大學的「香港恆生大學」，在何順文校長領導下，所提倡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配合專業教育，其內容及教育理念十分「博雅」和「專業」，而且積極推行。<sup>25</sup>

再看寂寂無名的「恩光書院」，2015年創立的基督教高等學院，推出文憑課程，科目包括：

- 從神學看文化與社會

· 基督教與現代文學

· 生態危機中的信仰生活

· 動漫文化的宗教向度

還有紀治興等人創立的「豐盛社企學會」。紀治興博士太平紳士提早退出商界從事發展社企事業。他有份創立的「豐盛社企學會」注重教導工作，不只是技術性的教育，而是有公共責任的培訓與輔導。<sup>26</sup>

### 第三部曲：中華文化 / 文明在世界洶湧巨流中與諸宗教互動、融合中產生的多元身分認同

中華文化 / 文明有五千年歷史，多個大宗教也是有長遠歷史的及廣闊傳開的，在世界洶湧巨流中，無可避免多方面的互動（包括碰撞、衝突、融合、共存等）：此中產生多元身分認同。

講到中國文化與宗教研究，這是本人及「宗文社」的本行。由慘淡經營的日子，到粗略地摸到一些可行的方向，而後來也有相當規模的研究探討。

#### 1. 文化宗教對話及研究

1988年宗文社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及新亞書院哲學系聯合主辦的第一次「國際儒、耶對話會議」。與會者是國際聞名的儒學者及基督宗教（天主教、新教）領袖及神學家，共八十餘人。該第一屆國際儒、耶對話會議的成果已結集成書。<sup>27</sup> 之後繼有四屆儒、耶對話會議，分別在美國柏克萊、波士頓、香港舉行。此一系列會議證明耶、儒對話及交流是有國際學術價值的，可是後繼無人。

23 同上，頁290-291。

24 同上，頁360-361。

25 參香港恒生大學網頁：<https://www.hsu.edu.hk/hk/about-hsuhk/vision-and-mission/>。

26 參豐盛社企網頁：<https://www.fses.hk/>。

27 Peter K. H. Lee, ed., *Confucian-Christian Encounters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1).

## 2. 宗教與和平

1980至90年代，宗文社有份積極參與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宗教與和平研討會。例如「東南亞宗教與和平協會」曾在香港舉行一次研討會，參與者包括南韓、日本、台灣、香港的宗教界代表及經濟、政治、軍事學者。本人是東道主又是講者之一（題目是「沿着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和平』觀念說起」）。其他的文章及討論都有豐富內容，可惜結束之後有份主辦的人士反省，該研討會未知如何跟進實踐和平。另一次會議由天主教東南亞主教團的宗教與和平委員會主辦在新加坡舉行。本人有幸獲邀請為嘉賓講員。該次會議在理論方面的獲益是不淺的，又是在實踐方面未見有下文。

## 3. 宗教教育工作

普世教會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屬下的一個「亞洲青年宗教友愛計劃」（Youth in Asian Training for Religious Amity）在2018年7月7至15日，假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聚合二、三十個不同宗教的大專青年，在友誼關係中認識諸宗教的基本信念及實踐。本人負責講解孔子、孟子及老子、莊子思想（用《論語》、《孟子》、《道德經》第一章、第卅一章、《莊子·逍遙遊》）。此次實地驗證幾本中國文化的經典教材，實在具有重要的教導作用。有數位馬來西亞華僑青年基督徒初次接觸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思想，下決心回馬來西亞後從事宗教教育工作，並聲言不可忽略伊斯蘭教思想。

## 4. 禪悟與聖經

曾錄下「禪悟讀聖經數則」。茲引用一則。

〈因雪〉 (宋) 守端

瓊花一夜滿山空，  
天曉皆言好雪寒。  
片片縱饒知蔭處，

奈緣猶在半途間。

「禪悟」轉入舊約《以賽亞書》55章10至11節。〈因雪〉的「禪機」是：半空紛飛的雪花隨意飄蕩，其自性是空山的「空」。

《以賽亞書》55章10至11節：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撒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再轉入新約的《腓立比書》2章6至10節。本有上帝形象的耶穌，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耶穌的「虛己」也意味着「空」的理念，伸展到死的終極——但到頭來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sup>28</sup>

## 5. 思辨「大同」與「小康」

五四運動幾位代表性人物：胡適、李大釗、梁漱溟。胡適是白話文學運動先鋒，亦是新思潮文化健將之一。白話文學運動和新思潮文化都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重要思潮。胡氏他後來為離開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任要職。李大釗1920前後數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一小樓閣與毛澤東成立一小組研究馬克思思想。及後中國共產黨雛型成立，毛澤東為主席，李大釗為副主席。中國共產黨尚未建立為強大政黨之前，李大釗遇害身亡，而他可稱為介紹馬克思主義入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梁漱溟於1910年代後期受任北京大學教席，教授東西文化比

<sup>28</sup> 「禪意讀聖經數則」，載於李景雄：《與龍鳳共舞》，（香港：漢語文研社，2004）。

較及中國哲學。他的文化視野相當廣闊，而他的儒學根基穩固。五四運動發生時，梁漱溟並不全面反對抗議行動或宣言，可是他的東西文化比較視野間接提供中西文化爭議另類觀點。再者，梁氏的「心學」根底深厚，可稱為現代新儒家的前輩。奇妙的是，他一直以來留居國內，經得起「打倒孔家店」、反孔批鬥，依然屹立站得住。他還繼續發表演論，仍受國內外有識之士的注意。總的來說，胡適、李大釗、梁漱溟，三位五四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其言論各自仍然掀起漪漣，波及或遠或近的文化領域。

## 結語

中華文明的演變、全球的大局勢、一百年的回顧與前瞻以及人類文明的命運，都是「大敘事」（meta-narratives）！今作結語如下：

一．進入廿一世紀的全世界大局勢是洶湧洪流，具有長遠淵源宗教元素的文明系統，捲入其中的漩渦，定然產生碰撞、交織、調整、融合。可是在香港、中國以及華人族類的周遭可有什麼較「落實」的出路呢？就以社會、經濟、政治、法治而言，定形的新秩序尚未出現，尋獲確定性的新秩序是遙遙無期；極其量是適應、妥協、修改，隨機應變。例如香港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特別行政區，本來就存在着矛盾的成分。因為強勢力在上，弱勢力在下，多時便是在上的壓抑在下的，肯定欠缺公平、穩定。又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更有複雜的歷史因素。國民黨和民進黨對大陸的策略總是一場又一場的拉鋸戰。可是經濟及投資的措施則較有彈性。

二．廿一世紀的高科技及尖端理論物理學、宇宙學，遠遠拋離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啓蒙時代科學萌芽。然而是否人類文明、心靈慰藉、精神生命的渴求，就退縮甚至泯滅？未必如此。反之，人道主義、人心重整、精神生命的肯定、宗教性的終極關懷，愈加反彈還擊。這就觸及教育培育的再思、宗教信仰的復甦、人類文明的復興。

三．中華文明的身分認同是多元的，因為世界文明就是多元的分類、層次、重組。此中無疑有順理成章的應對，亦有拉緊的張力和劇烈的轉變。有「世界公民」的仁人達士地位身分，也有邊緣化移民的悲慘厄運。

最後，還有「天國子民」的殊榮。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天國的子民是被揀選的族類，同時他們有宣揚拯救世界的使命，即使是跨國界、跨種族、跨宗教的作為，亦可展現。如此一來，「天國子民」的身分認同更是多樣式。是的，天國不全是遠離世間，卻是「在地若天，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國度、權柄、榮耀，永世無盡。」